

汤伏祥 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种奇特现象，在五四运动后，一些文学干将，因为彼此的理论、观点、理解、文风，甚至信仰的不同，也就因此而产生了一些矛盾或者说宗派斗争……

■ 萧军与萧红

萧军与萧红的结合，纯属偶然。20世纪30年代初，受过中等教育的萧红，和当时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受鲁迅先生的《伤逝》和易卜生的《娜拉》影响，不满于封建婚姻而离家出走。后来，萧红被困居在一个旅馆里，险些被当作人质卖给妓院。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就是萧军……端木的到来，使原本紧张的住房更加紧张，曾一度，萧军、萧红、端木三人睡在一张大床上……

■ 现代文坛恩怨一瞥

■ 沈从文与萧乾

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萧乾把写小说确定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沈从文被逐出文坛后，虽然神情一度紧张，但他后来总算在博物馆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 湖南人民出版社

恩怨情仇

汤伏祥 著

恩怨沧桑录

■ 现代文坛恩怨一瞥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汤伏祥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5438-4323-4

I. 恩... II. 汤...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
中国-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614 号

责任编辑:文 驰

装帧设计:陈 新

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

汤伏祥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汇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30×960 1/16 印张:18.5

字数:260,000 印数:1-8,000

ISBN7-5438-4323-4

I·427 定价:32.00 元

序

袁良骏

汤伏祥同志寄来了他的《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部分书稿，让我为他写篇序。虽然盛情可感，但却实不敢当。我虽然在课堂上教过现代文学，在文章中研究过现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坛的恩怨沧桑却知之甚少。不错，在我的一些关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冯雪峰、丁玲等的文章中，曾经触及过这个课题，但都是蜻蜓点水，一闪而过，何曾像伏祥同志这样下过大功夫？又有何资格写序？但架不住伏祥同志诚意拳拳，却之实在不恭，只好谈一点读后感想。

谈现代文坛恩怨，离不开现代政治风云。五四文学革命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分歧（包括鲁迅与成仿吾的交恶）、“左联”与“新月派”（主要是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鲁迅与施蛰存的论战、“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论争”、抗日战争年代延安的周扬丁玲之争、解放战争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对“反动文艺”的批判、建国后周扬对冯雪峰丁玲的彻底清算……所有这些现代文坛恩怨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无论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保守文艺的冲击，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对资产阶级文艺的清算，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内部的派别之争，都深深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的烙印。《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一书，并未（也不可能）涉及现代文坛全部的恩怨沧桑，但它在自己所涉及的范围内（比如周扬与丁玲、丁玲与沈从文、沈从文与萧乾等），都没有停留在恩怨表面，而是深刻挖掘了政治和时代根源，发人深省，甚至让人震颤。比如





建国后周扬对冯雪峰、丁玲的清算斗争，除了利用丁玲的某些历史弱点外，主要是利用现实的政治斗争，以道貌岸然的姿态、极端革命的名义进行的。1955年，周扬试图把丁玲、陈企霞打成“反党集团”，虽然局部得手，但终以失败告终。何以故？政治气候未到也。两年之后，“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时机到了。把冯雪峰、丁玲打成文艺界的“大右派”、“大右派集团”，这正适合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需要。其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狠狠批斗，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然也是周扬所不能左右的，过多地责怪周扬有失公允。哪怕你丁玲、冯雪峰党龄再长、功劳再大，只要给你扣上向党进攻的“右派”帽子，你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乖乖地任我宰割了。“反右”当年，各大报刊、电台正是把“揪出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当成全国“反右”斗争的辉煌战绩来鼓吹、来宣传的。尽管若干年后给你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但周扬的目的已经达到，文艺界的“宿敌”算是剔除了。即使你又恢复了党籍，但手下败将，已不构成任何威胁了。

文坛恩怨沧桑源自时代风云，反过来，透过这种恩怨沧桑，人们也就可以大大加深对时代风云的认识。在这方面，某些智商极高的人往往表现得很幼稚。比如丁玲，她一直认为是周扬蒙蔽上面组织部门将她打成了右派。这怎么可能？周扬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根据上面组织部门的指令（甚至红头文件）来进行的。“反右”是有指标的，不达到百分比要补课。你丁玲、冯雪峰恰好在指标之内，不打你“右派”打谁？各大报刊通栏标题、大张旗鼓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胜利，上面组织部门会不知道？仅仅靠周扬“蒙蔽”怎能行？事实上，没有上面组织部门的恩准和“圈阅”，像丁玲、冯雪峰这样的“左联干部”、“长征干部”是无法戴上“右派”帽子的。诚然，丁玲刚到延安时，毛主席专门为她写了《临江仙》词，她写的人物特写《田宝霖》也曾受到毛主席的称赞。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丁玲在建国后依然和其他一些

文化界名人一样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身心遭受巨大的创伤，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常人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更何况是丁玲呢？从丁玲的惨剧，我们不难深深回味极左路线的残酷和可怕。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条极左路线的登峰造极。如果不是邓小平、党中央及时拨转航向，改革开放，清算“极左”路线，中华民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文坛的某些恩怨沧桑，往往是政治的投影和折光。唯其如此，这些恩怨沧桑才跳出了个人的范畴，而有了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

这样说，绝非否定或削弱某些个人的作用。周扬利用了“反右”，为什么不是茅盾利用了“反右”？胡乔木利用了“反右”？丁玲、冯雪峰的厄运毕竟是周扬一手造成的，他的心狠手辣、置人于死地，的确在“反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套用一句毛主席的名句，周扬是一个改造得很不好的宗派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他对鲁迅搞宗派主义，闹得鲁迅腹背受敌，必须“横站”；“反右”之中，他的宗派主义镀上一层黄金，几乎把丁玲、冯雪峰双双整死。其实，早在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冤假错案中，周扬已经上下其手了。

当然，有些恩怨沧桑并非都有同样的时代意义、政治意义。比如萧军、萧红的恩恩怨怨，就和周扬、丁玲的恩怨远非一个性质。他们的恩恩怨怨更多是性格使然，和时代虽有关系，但毕竟不那么直接。这一点，汤著的描述必是分寸得宜的。

敢于揭示作家之间的恩恩怨怨，这应该说是现代文学研究深入的表现，它大大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在这方面，单篇的文章并不少见，但以之成书、系列展示者，似乎不多。这就使汤著具有一些“领头羊”的性质。由于该书涉及的领域、事例太广，目前的描述还只能说是“抽样”。但愿著者继续努力，乘胜前进，借以时日，呈现给读者更为厚重的修订本。我深信这一愿望绝不会落空，我愿为它的修订本再序、三序……

目 录

导 论	1
-----------	---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种奇特现象，在五
四运动后，一些文学干将，因为彼此的理论、观点、理
解、文风，甚至信仰的不同，也就因此而产生了一些矛
盾或者说宗派斗争……

周扬与丁玲	30
-------------	----

丁玲辞去“左联”党团书记后，周扬成为“左联”
书记，在党内受到重用。由于对政治以及对文学与政治
之间关系的不同见解，周扬与鲁迅、冯雪峰、丁玲等人
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周扬与丁玲的恩怨并
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相反，他们在晚年还
有愈演愈烈的感觉……

丁玲与沈从文	85
--------------	----

胡也频的遇难，使丁玲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沈从
文这个时候顶住各种流言蜚语，承担起胡也频作为“丈
夫”的义务……

沈从文开始感到时局对他不妙，他正背着沉重的历
史包袱，甚至还出现精神失常现象……就在这个时候，
沈从文听说他昔日的友人丁玲回到了北京。丁玲在危难

的时候，想到的是沈从文，得到的也是沈从文的帮助与关爱；沈从文在困苦不堪、思想迷惘的时候，想到的理所当然的是丁玲。然而，当沈从文去找丁玲的时候……

沈从文与萧乾 127

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萧乾把写小说确定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沈从文被逐出文坛后，虽然神情一度紧张，但他后来总算在博物馆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在博物馆里耐心地做他的讲解员，而此时的萧乾，满怀对新中国的热爱，积极担当“人民的吹鼓手”。可就在他们都各自埋头工作的时候，一场人为的暴风骤雨却突然袭来。一是甘于寂寞，一是远离政治的沈从文却一改过去的作风，也站出来揭发，说萧乾同志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

郁达夫与王映霞 180

在婚姻爱情观念上，性爱观念和个性意识上，五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郁达夫却没有完全秉承五四思想。郁达夫认为，妓院可以保留，甚至主张男人可以一夫多妻……但郁达夫是一个率真、浪漫、忧郁的性情中人，他属天上之人，而非凡人；王映霞作为一个女子，她有自己的追求，她喜欢流连于上流社会。在心灵越来越疏远的情况下，在相通渐渐散失的情况下，婚姻就意味着快要死亡。而王映霞与许绍棣的传闻，终于成了他们婚姻死亡的导火线……

萧军与萧红	242
-------------	-----

萧军与萧红的结合，纯属偶然。20 世纪 30 年代初，受过中等教育的萧红，和当时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受鲁迅先生的《伤逝》和易卜生的《娜拉》影响，不满于封建婚姻而离家出走。后来，萧红被困居在一个旅馆里，险些被当做人质，卖给妓院。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就是萧军……端木的到来，使原本紧张的住房更加紧张。曾一度，萧军、萧红、端木三人睡在一张大床上……

主要参考书	284
-------------	-----

后 记	286
-----------	-----



导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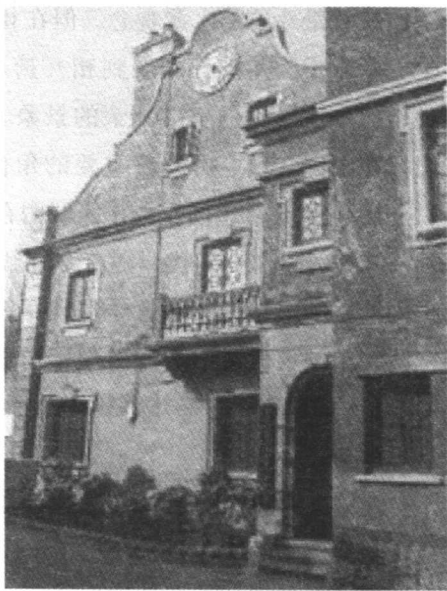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五四运动后，一些文学干将走到文学运动的前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或组织各式各样的文学社团、主办文学报刊，为现代文学的丰富添砖加瓦。他们由于自己的生活背景，加上对新时代文学的认可、理解程度的不同，或者对文学本身的理解迥异以及西方文艺理论的不断涌入，而产生了許多理论观点或文学流派。这些流派、组织、社团在各自的论战、论争中发展。也正是因为彼此的理论、观点、理解、文风，甚至是信仰不同，也就因此而产生了一些矛盾或者是斗争的宗派观念。但在相对民主、自由的氛围下，这种宗派斗争、宗派矛盾并没有发展到相互搏杀的地步，除了文字上的斗争、论战外，似乎还因此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文学社团、组织在中国文坛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左联”的成立。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成为其联盟的精神领袖。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个性解放主题的逐渐淡化，自我表现向客观再现的不断横移，文学题材领域由个人情感天地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革命文学登上历史舞台。“左联”的成立，进一步深化了革命的主题，并构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思潮与运动。

左翼文学思潮与运动，是伴随着五四个性解放文学潮流的衰退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在20世纪30年代，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方向是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主导方向。左翼文学把文学与政治结合起来，强化创作主体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在当时有其历

史的必然选择和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的必然选择和要求日益受到困扰，表现出文学与政治的尴尬关系。就在左翼作家们试图强化自己的文学主张时，1931年，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到来，反帝抗日的文学主题同阶级斗争的主题开始呈现出分化的趋势，随后也就有了“两个口号”的论争。

在一种革命的、政治的、阶级的范式约束下，文学的主题本来应该统一划一，但事实上，就在左翼作家内部，本身就存在不同的文学主张。以成仿吾、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完全意识形态化的革命文学，而以鲁迅、冯雪峰、胡风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文学在体现政治化的生活的同时，还应该追求文学的真和美。以茅盾、周扬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似乎介于上述两派之间。在一个“集团”的内部，有了这些不同的主张和倾向，彼此之间虽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可以趋向统一，但事实上正如一个单位一样，由于各派之间有了不同的看法，虽然在谋求单位的发展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但平时彼此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在表面上看似没什么大碍，但由于彼此的主张不同，并加上展开论争、附和者逐渐追随，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宗派观念。后来事实已经证明，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内部产生的宗派观念是相当的严重。丁玲和周扬的宗派斗争，以及后来的诸多矛盾可以说就是源于此的。

丁玲是“左联”的“老资格”，在“左联”刚成立后，就参加了“左联”，次年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1932年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旧址

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左联”党团书记。而周扬是1928年上海大厦大学毕业，毕业后去日本留学，1931年回上海，先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次年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开始领导革命文艺运动。在丁玲辞去“左联”党团书记后，周扬成为“左联”党团书记。从这两人在“左联”内的资历来看，丁玲似乎更占据上风。但当时情况比较复杂，周扬在党内受到重用，担任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虽然丁玲、冯雪峰等人与周扬的宗派矛盾由来已久，但在表面上没有直接的冲突，甚至周扬刚到“左联”时，冯雪峰还把“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姚蓬子撤了职，改由周扬来担任。

由于对政治以及对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不同见解，周扬与鲁迅、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甚至形成了“宗派斗争”。

当然这些宗派矛盾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算什么，因为当时的文艺民主气氛还是相当的活跃，大家不同的文学主张可以彼此表达出来，并在报刊上展开论争。这从某种程度上，也缓和了宗派矛盾，或者说宗派矛盾已经通过宗派情绪释放到报刊的论争中，宗派观念还只是表面化的现象。但这种表面化的现象随着民主论争的夭折，表面消失，而事实上在积蓄更大、更可怕的宗派斗争。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一切形形色色的文学主张都被统一在了“讲话”的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为干部讲课



大麾之下，表面上大家的意见得到了统一，各种宗派斗争消失，丁玲与周扬的矛盾也在表面上消失了。这种表面和睦的宗派矛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都相安无事。因为在解放前后，左翼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反动文人”的丑恶本质，批判“反动文人”的文学主张，以净化文学、强化文学的政治功能，更好地为人民政权服务。比如组织对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批判等。丁玲和周扬是同属于一个阵营的作家，都是解放区文学的领导者，对非解放区的文学有批判的一致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起初丁玲对肃清“反动文学”、“腐朽文学”，揭露“黑暗文学”还没有充分的认识，甚至自己还差点卷入其中，但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指引和整风、批判下，她总算知道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并很快适应了当时的斗争形式，比如对王实味的批判，她就掌握了批判的要领。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宗派的表面斗争，周扬、丁玲等人在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创作文学，领导文艺批评。可是就在这种严森的政治氛围下，只要有一个小孔，都可能爆发新的矛盾，“反右”斗争开始时，一些人就将过去的老账搬出来算了，周扬和丁玲的矛盾也要在这个时候清算。在政治上占优势的、过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的周扬抓住了“反右”斗争的绝好机会，打击丁玲，清算他们的宗派恩怨。早在“反右”斗争还没轰轰烈烈展开的1955年7月下旬，在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等人的操纵下，他向中央写了一份《中宣部关于中国作协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在8月3日至9月6日举行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丁玲、陈企霞被诬为“反党小集团”。9月30日，中国作协党组写出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报中宣部并转呈中央。12月15日，中央批注了这一报告，并向全国文艺界传达。1956年春，当丁玲知道自己被秘密定为“反党小集团”后，就所谓的“反党小集团”和所谓的历史上“自首”问题给中宣部机关党委写申诉材料。6月下旬，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牵头、副部长周扬和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珪参加的小组，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8月24日，中宣部形成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认为丁

玲“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1957年，国内形势骤变，6月中旬以后，中国作协秘密成立了反右派斗争指挥部。《在作协反右派斗争计划》中，将解决丁（玲）陈（企霞）问题列为战斗任务之一，丁陈曾领导过的《文艺报》被开辟为最主要的战场。从7月开始，作协不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反党行为和活动。会议先后开了24次，到9月17日结束，最后形成了《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经过的报告》和《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两项成果。并提出解除丁玲的作协副主席等一切行政职务及刊物编委，开除党籍，人民代表和作协理事名义在下届选举时另行处理，作为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

在这场对丁玲的政治批判中，周扬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长期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拿丁玲开刀，除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外，其与丁玲的长期宗派矛盾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丁玲在文艺界的资历并不比周扬浅，他对周扬常有一种不屑的姿态，甚至在不同的场合以此来攻击周扬。丁玲和周扬都是“左联”的早期成员之一，丁玲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周扬还是她的继任者。在“左联”时期，丁玲的背后有鲁迅、冯雪峰等人的支持，在文艺界也算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周扬相对来说并没有丁玲来得显赫，他的文学成绩主要是在理论贡献上，文学创作几乎谈不上，在文坛上并不是显赫的作家。到了延安时期，丁玲和周扬的实力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扬当上了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而丁玲只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等职，相对来说，周扬似乎得到了重用。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当



20世纪50年代的丁玲

上中宣部副部长，而丁玲只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非常讲究职位高低、职权大小的中国政治环境中，周扬无疑占据上风。而在丁玲看来，周扬比自己资历浅，怎么可以领导自己呢？她不满于、不服于周扬的领导，暗中明里与周扬较量。在这一轮的较量中，丁玲彻底输了。1958年3月，被划为右派的陈明离京去黑龙江农场改造，6月丁玲也去黑龙江农场改造。1970年，丁玲被北京公安局拘捕押回北京，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中央专案小组作出“丁玲是叛徒”的结论。被释放出狱后与陈明一起安置在山西长治郊区的老顶山公社漳头村。1978年7月老顶山公社党委为其摘掉右派帽子，12月，经中组部同意回京看病。当然，周扬虽然在“反右”斗争中占据了上风，但在“文革”中，也同样遭受了迫害，被关进了监狱。

丁玲与周扬的恩怨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相反，他们在晚年还有愈演愈烈的感觉。彼此之间长期的斗争和矛盾，并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开的。在新时期，他们虽然都在反思自己的过去，都在努力摆脱过去不良的作风和错误的认识，但在对待彼此的恩怨上，却没能心平气和地做出让步。也许这一切正好说明了两人“不屈”的性格，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见解不同，彼此思想不同，也无所谓强扯在一起。但对于后人来说，要描述的倒不是他们之间的恩怨，也不是看官的看热闹。而是应该思考时代，或者政治与人性的关系。

为什么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人们之间的恩怨可以自然释放，可以彼此提出论争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许多人就“道不同不相为谋”，直接提出自己的主张，抨击和自己“道不同者”，比如鲁迅和梁实秋、顾颉刚等。虽然彼此争论不休，但却没有发展为政治斗争，梁实秋算是国民党阵营的代表作家，但并没有动用政治的手段来迫害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丁玲和周扬，虽然都处在“左联”的阵营里，但彼此之间已经有了一些矛盾，遗憾的是这些矛盾没有得到适当的释放，被表面的同一埋藏起来。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彼此之间的矛盾更不能公开化，人的私性、丑陋等都被掩盖起来。在强大的政治面前，

大家彼此只能和好、团结。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在国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个人的情感在强大的政治意识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思想都被封闭在一个匣子里，人性的丑恶，人性好斗的一面，思想异议的一面，都被不合时宜地统一了起来。事实上，人是有私性的，人的思想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要统一大家的思想，要让大家都发出同样的声音，要强迫大家都站在一个战线上说话，这是相当困难的。“反右”斗争算是在这绝对密封的匣子里，开了一个口，让彼此不同的人性表现出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这场“反右”斗争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场政治运动。新账、旧账、宗派矛盾、阶级矛盾等等，在彼此的揭发斗争中，愈演愈烈。人性的丑陋在运动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彼此揭发，制造矛盾，说违心话，无情批斗，诬蔑等等，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命运着想，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人性本是丑恶的，在强大的政治运动中，在冷酷的政治斗争中，大家似乎学会了狡猾和奸诈，延安整风运动中，大家对王实味的批判就是一例。“反右”斗争，又为丑恶的人性提供了一次表演的机会。在没有法律，或者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人性的丑恶无疑加速了政治运动的发展，最终使大多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遭殃。良性的政治模式，可以暴露人性的丑恶，也可以教化人性；而高压的政治模式，不仅暴露了人性的丑恶，还助长了人性的丑恶。人性的丑恶，在良性的政治模式下，可以推进社会民主



晚年周扬

的发展；而在高压的政治模式下，只能导致政治环境的恶化。没有良好的政治模式，人性的丑恶可能导致灾害，可能导致历史的倒退。从周扬和丁玲的斗争，从新中国成立直到1978年，在不健全的政治模式下，所发生的相当多的事情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丁玲和周扬的恩怨是长期宗派矛盾、是丑恶的人性在不健全政治模式下斗争的结果。而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怨则更和丑恶的人性及不健全的政治模式分不开了。从1925年的春天开始，两位同来自湖南的文学青年，在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产生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他们第二次见面后，先是在香山住了一阵子，后来他们三人（另一人是丁玲当时的丈夫胡也频——著者注）搬进了北京城，并曾一起住进了公寓，一起生活，一起创作。1928年2月，沈从文来到上海，两个月后，丁玲和胡也频也来到上海。刚到上海的第一天，他们就住到了沈从文的住处。后来，由他们三人商定，创办了《红与黑》。后来《红与黑》停刊，他们三人又开始筹划出版《红黑》、《人间》杂志，并筹划自办出版社。他们为了开辟属于自己的广阔文学天地，又一次住到了一起，租住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的一幢小楼房里。也就在这当中，和在北京汉园公寓生活时一样的流言又开始了。在北京汉园公寓时，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三人生活在一起，社会上流传他们三人同居。在萨坡赛路里同样招惹来满城风雨。上海滩上的小报小刊说他们是“三角恋爱”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在提到这件往事时，还说他们曾在上海“大被同眠”。撇开“大被同眠”或者“三角恋爱”不讲，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他们的友谊是多么的深厚。《红黑》、《人间》使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在上海确立了自己的文坛地位，发射出一束束属于自己的光芒，也因为彼此的密切关系，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恐怖气氛笼罩着神州大地。就在这时候，丁玲、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从事政治活动。沈从文为他们担心，并责备他们不耐烦从事文学创作而转向社会活动。沈从文认为他们是热情有余，冷静不足。后来，胡也频被捕了。胡也